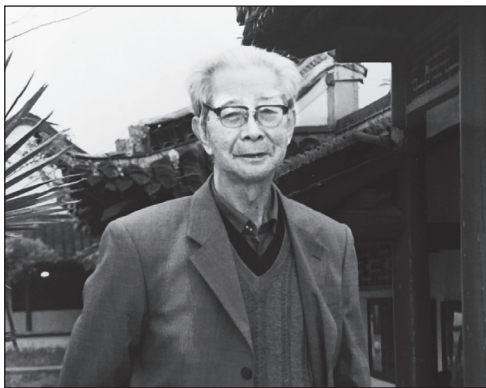


## 70 余载兄弟情

——纪念挚友王楫

○ 顾润兴（1947 届法律）



王楫学长

数十年来，我和老同学王楫每年元旦互寄贺卡，既是拜岁又是互报平安。2017 年我在寄出贺卡后未能收到回信。春节时打南通电话，他儿子承炜说：王楫除夕前两次脑梗，现在住医院治疗。王楫长我三岁，98 岁高龄。我从情感上说，祝愿他早日康复！

2017 年 11 月 6 日接承炜电话，说王楫兄于 10 月 6 日仙逝远行。这一意料中的信息还是使我黯然神伤。我同王楫在人生轨迹上有多次交集，有相似的经历和理念。在人生长途中不少往事还历历在目。

我们初次相交，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旧上海租界菜市路上海弄内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938 年高二时他前来复学。此

前上海中学在吴家港时，他已上高一，可能因为“八一三”淞沪战役，家在南通的他辍学一年。上海中学理科多数同学重视数理化，目标瞄准北京大学。他同张源潜坐在后排，同桌且都喜爱文学，除课程外常写一些散文。他笔名王季，源潜笔名小芸。在租界的孤岛环境中，利用手中的笔写出抗日反汪伪的投枪。我们也一起从事一些反日伪的宣传活动。他和源潜都老练朴实，视我为小弟弟。1940 年夏，我们高中毕业。理 29 甲级 42 位同学 23 位考取京大，11 位进入其他高校，只有 8 人因家庭经济原因就业。当时学校组织介绍投考各个银行，我同王楫都进入中国银行，源潜进入上海商业银行。王因为国文成绩好，派在中国银行总处，在霞飞路的办公处，我派在新闻路办事处，张源潜不久去了昆明工作。

王楫家在南通，进中行后住在极司菲尔路中行别业宿舍。1941 年春，汪伪为报复国民党军统在上海暗杀敌伪银行人员。在某日晚由 76 号特务到中行别业绑架中行职工百余人，王楫也在其中。后来在释放时，汪伪特务枪杀了 3 名中行的中层干部。事后，中国银行在上海紧缩，王楫被调往香港中行总处的译电室。我工作的新闻路办事处裁撤后，那年 11 月调往香港的中行沪驻港处。当时的香港表面上很繁

荣、平静，不少中国的机构和文化界民主人士都聚集在此。我们在香港的几个上海青年，在假日乘缆车登扯旗山眺望港九湾景。12月7日下午，我同王楫等人还在湾仔利舞台看电影，荧幕上展出通知，命香港的英军士兵返营。我们观毕电影，在半山步行到中环时，只见英军的装甲车驶出巡逻，大家不以为意，还去了厚德福吃了晚饭。12月8日是星期一，我从尖沙咀亚厘士大道到天星轮渡海，那时已封锁，无通行证不得乘渡。这时方知早上似是演习的爆炸，是日本在发动珍珠港偷袭，同时向香港启德机场投弹。王楫那时住在香港坚尼地台的中行宿舍，我在数日后，由九龙乘木船偷渡到香港，寄宿在王楫宿舍，只带了一只小皮箱，晚上同王楫同盖一条既薄又短的被褥，半夜冻醒，至今记忆犹新。隔了数日，日英隔海炮击，坚尼地台也波及。我同王楫带了些行李下山，行到兵头公园附近，空袭警报鸣响，工人奔向防空洞。后来大家都在办公室打地铺，直到12月25日圣诞节港督挂出降旗。

1941年12月至1942年3月，我们一起困居港九，中行除香港分行照常营业外，所有总处、沪行驻港人员都在待命。1942年，日军为减轻香港供应的压力，实施疏散政策。中行在港人员接总处令，在1942年3月，一支1万余人的队伍搭乘日轮的白银丸，经澳门去法租界地广州湾（现湛江）。从广州湾过境到广西赤坎，经过遂溪、廉江、玉林到柳州，其间还乘火车到桂林一游。以后从柳州到贵阳，再从贵阳到重庆，历时两个月。

王楫到重庆在城郊牛角沱中行总处译电室工作，我则派到玉灵洞的沪驻渝处。

那时，两人都是练习生，按中行规定练习生要工作三年升助理员，再过三年五年升办事员。我不久由中行调到城区重庆分行大厦内的中行附业中国保险公司。在重庆期间，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在城区，王楫在周末，自牛角沱进城。那时重庆盛演话剧，我们一起在银行公会、国泰影院等看过《家》《日出》《北京人》《屈原》等剧，观剧晚了，王楫就住在我的城区宿舍，到长江边乘凉夜话。

张源潜1942年在昆明辞职，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后转中文系）。在他的引介下，王楫积极准备，在1943年夏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我当时虽在中保公司担任会计主任，也心想读大学，1943年春，上海的两所教会大学东吴、沪江在重庆成立联合法商学院，按上海做法，晚上六点半到九点上课。我因而考入该校，先读工商管理，后读法律。王楫到联大后经常通信报道一些联大的情况，包括名师课程和各类学运活动，如1944年的五四晚会。这些通信，使我对联大向往非凡。为了提高外语水平，我们常常用英文通信。

1945年上半年，欧洲战场胜利结束。日本在太平洋战争节节败退，我们胜利在望。我决定离职进大学，于是以东吴二年学历，投考联大法律系三年级为转学生。经过紧张的准备和应试，于8月初收到联大录取通知。我于8月从重庆珊瑚坝机场搭民航机飞昆，下午到达巫家坝机场。王楫和源潜借了辆平板车到机场接我，边走边聊，同他们一起到钱局街70号他们在校外租用的民居。那年源潜因家事休学一年，自昆明回松江，我便住入他们的居室。我从中保辞职，原可以领取胜利后复员的遣散费，但因我参加争取

## □ 师友情

改善待遇的怠工行动，不允发给。我在联大仅有伙食的贷学金，别无经济来源。王楫那时（大三）已在昆明市内的业余中学兼课，便将他为在裕滇纱厂工作的南通同乡鱼月秋的英语家教让给我，这样我便要在联大食堂用过晚餐后，走跨半个昆明市区，到东南角的裕滇宿舍去当家教。

我到联大，人生地不熟，除法律系的同班同学十余人外，很少与其他人交往，倒是在钱局街住所同王楫外文系和他们文艺社的一些同学有所接触。其中有程法伋、王景山、赵少伟、邱从乙、刘晶雯。当时文艺社同其他社团，正开展文艺为什么的争论，文艺社主张文艺为生活。我只作为旁观者，注视“文艺壁报”。王楫后来晚间也住在城内业余中学。在11月26日时事晚会枪击事件和其后的“一二·一”惨案后，以联大、云大等为核心的罢委会发行《罢委会通讯》，王楫那时为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就组织文艺社人员活动，主持《罢委会通讯》等。我在“一二·一”当日特务围攻新校舍时，就在现场，因之同仇敌忾，我曾写遗嘱，并作《血债要用血偿》等文，还帮助《罢委会通讯》的校对和送印等工作。

1946年春，云南大学先修班同学要补习英语，由王楫介绍我去任教。他在市内业余中学兼课并负责部分行政工作。除到新校舍上课外，已不住在钱局街。我去市区时，曾两次到业中见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聂静涵。她谦和豪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有一次在新校舍图书馆草坪上，王楫对我说起，静涵出身一个革命家庭，她自己在邓颖超领导下做过革命工作。当时中共处于地下，王楫敢于对我说此秘

事，足证明他对我的信任和友谊。

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常委在图书馆开会宣布联大结束，未毕业学生按其意愿分配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院留昆成立云南师范学院。我在6月随学校组织的复员队伍经过滇黔湘鄂经长江回沪。王楫因业中和同静涵的婚恋，未去北平读大四。我因为旅途需款，向王楫借了12万元，后以在昆明扶轮社征文获奖的奖金归还。

我在1946年10月去北平北大，1947年6月回沪工作。同他通信，知他同聂结婚回南通老家。1948年，他到上海走访，聚谈别后景况，那次谈拟去扬州师院任教，在我处借去英文小说毛姆的*Human Bondage*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解放以后，由于政治运动频繁，一些旧日同学间较少来往。只知他去了扬州师院，并邀请源潜，自松江调扬共事。王为教授，张因1957年遭难为副教授。

“文革”以后，老同学逐渐恢复交往，我同妻子荷娣1986年参加旅行社的镇扬游，先期致函王楫，拟到扬州时走访。及至师院宿舍，那时王、张都已退休，我则在上海贝尔公司工作，只见信件放在桌上，王楫去了北京。当日，由王嫂聂静涵约了源潜夫妇同游瘦西湖，当晚宿在王府。次日早晨静涵嫂还招待去品尝扬州早点。如今当时留影尚在，源潜、静涵、荷娣都已作古，源潜嫂不知安好否？

王楫后来几年多有通信和互寄照片，其中有他同静涵结婚纪念和静涵回南通后患癌症逝世后的追悼会情况，以及他去南方、香港旅游和同源潜合影等。

进入21世纪，有一年王楫同其子承